

# 大家说历史

## 来新夏说北洋

◎ 来新夏 焦静宜 著



大家说历史

来新夏说  
北洋

◎ 来新夏 焦静宜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K258.207  
L02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来新夏说北洋/来新夏等著.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9. 1

(大家说历史丛书)

ISBN 978-7-5439-3728-4

I. 来… II. 来… III. 北洋军阀史-研究 IV. K258. 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74062号

责任编辑: 张 树 李 莺

封面设计: 许 菲

**来新夏说北洋**

来新夏 熊静宜 著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长乐路746号 邮政编码20004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常熟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740X970 1/16 印张10.75 字数170 000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978-7-5439-3728-4

定价: 19.80元

<http://www.sstlp.com>

## 作者简历



2007年11月

来新夏,1923年生,浙江萧山人。1946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系。曾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校图书馆馆长、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图书馆学系系主任等职。美国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顾问、日本独协大学客座教授。现为南开大学教授、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学术团体职务为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顾问。主要从事古典目录学、中国近代史、方志学和图书文献学等方面的研究。2002年获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年度“杰出贡献奖”、2003年获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学术著作有《林则徐年谱新编》、《古典目录学》、《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中国近代史述丛》、《中国地方志》、《北洋军阀史》、《结网录》、《遼谷文录》、《三学集》和《清人笔记随录》等近30种。随笔集有《冷眼热心》、《路与书》、《依然集》、《遼谷谈往》、《枫林唱晚》、《一苇争流》、《且去填词》及《来新夏书话》等10余种。

# 目 录

## 总 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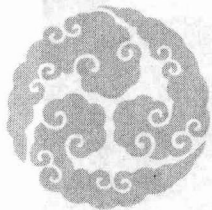
- 001 一、释“北洋”
- 002 二、“军阀”与“北洋军阀”
- 004 三、北洋军阀的特点
- 013 四、北洋军阀集团历史作用的估计

## 分 说

- 015 一、小站练兵——新建陆军
  - 015 1. 清末的军制改革
  - 016 2. 编练新军的实验
  - 018 3. 袁世凯宣传练军主张
  - 021 4. 袁世凯与“新建陆军”
  - 026 5. 新建陆军的特点
- 031 二、20世纪前后的政治风云
  - 031 1. 帝国主义侵略的新战略
  - 032 2. 维护封建统治的两种势力
  - 033 3. 民众的自发反抗
  - 034 4. 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 035 5. 对总形势的估计
- 036 三、袁世凯正位北京
  - 036 1. 袁世凯权力的起伏
  - 039 2. 袁世凯操纵南北局势
  - 042 3. 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
  - 044 4. 迁都之争与京保津兵变
  - 049 5. 袁世凯在北京继任临时大总统
  - 052 6. 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
- 055 四、民初社会习俗的变化
  - 055 1. 解放思想，破旧立新的时代潮流

062	2. 移风易俗中的逆向势力
066	3. 对民初社会习俗变化的几点思考
067	<b>五、“洪宪帝制”</b>
067	1.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准备
074	2. “洪宪帝制”丑剧的出台
079	3. 护国战争
081	4. “洪宪帝制”的失败
081	<b>六、张勋复辟</b>
081	1. 民初的复辟思潮与活动
083	2. 张勋其人
086	3. 中外反动势力对复辟的利用
089	4. 徐州会议
090	5. 复辟闹剧的上演与失败
096	<b>七、三次军阀混战</b>
096	1. 直、皖、奉三系军阀
098	2. 直皖战争
104	3. 第一次直奉战争
114	4. 第二次直奉战争
120	<b>八、溥仪出宫</b>
120	1. 故宫沧桑
122	2. 溥仪被驱逐出宫
123	3. 逊帝的噩梦
126	<b>九、北洋军阀的覆灭</b>
126	1. 北京政变后的政局
128	2. 天津会议
130	3. 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
132	4. “善后会议”的召开和奉、直、国军阀混战
135	5. 直、奉系军阀的反革命“联合”
138	6. 张作霖被炸与东北“易帜”
142	<b>附录一 我和北洋军阀史研究</b>
147	<b>附录二 参考书目提要</b>

# 总 说



## 一、释“北洋”

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北洋军阀集团和它所控制的北洋军阀政府。那么,这个集团究竟为什么以“北洋”冠名,“北洋”一词又从何而来?

“北洋”一词在鸦片战争前就已出现,当时它与“南洋”并称,都是一种地域观念。嘉道时经世学者包世臣曾在议论南漕海运的文章中明确地界定说:

出吴淞口迤南,由浙及闽粤,皆为南洋;迤北通海,山东、直隶及关东,皆为北洋。

但鸦片战争后,特别是 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北洋”更具有特殊的含义了。从 19 世纪 40 年代到 60 年代之间,外国侵略者曾连续对中国发动两次鸦片战争,以求建立他们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情况有所不同,英、法、美各国都改变其方针,想借兵力给清政府,以助其平定国内的“叛乱”;清政府也向外国侵略者表示了进一步依附的意向,不仅拱手让与各项权利,而且于咸丰十一年(1861 年),在中央设立了专为与外国侵略者交往和服务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目的是为了适应半殖民地化形势发展的要求,任务是办理殖民外交,同时管理通商、海防、军务、关税、铁路、开矿、制造军火等事务,实际上总揽了整个“洋务”事宜。又为了便于能就地与外国侵略者交往和服务,而设立了“南洋”、“北洋”大臣。南洋大臣由两江总督兼任,掌管上海



北洋军阀头目：上排自左至右：冯国璋、袁世凯、徐世昌、段芝贵、张勋；下排自左至右：段祺瑞、曹錕、姜桂题、张怀芝、倪嗣冲。

天津历史博物馆藏

与长江各口以及闽、粤、浙三省；北洋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专管北方各省。因此所谓“南洋”、“北洋”，实含有为外国侵略者服务的意义，是清政府统治机构半殖民地化的表现和明证，而且也是掌握政府重要职权的机构。于是，“北洋”一词逐渐演化为清政府北方地区权力中心的象征，并成为社会上流行的语词。北洋军阀集团既起家于北洋地域，也就顺理成章地以“北洋”作为集团的标识。不仅人们如

此称呼它们，北洋集团本身也时以“北洋袍泽”来显示它们的一体。

## 二、“军阀”与“北洋军阀”

“军阀”这一名词最早的文献记载是《新唐书·郭虔瓘传》中所记：“郭虔瓘，齐州历城人，开元初，录军阀，累迁右骁卫将军兼北庭都护、金山道副大总管。”

郭传中“军阀”一词的含义有别于后世之所谓“军阀”。这个“阀”是阀阅之家的“阀”，是指世家门第，即指官宦人家门前旌表他们功绩的柱子。“军阀”是指有军功的军人世家，含有门庭显赫的褒意。但近代以来被冠之以“军阀”的个人和集团因处于潮流发展的对立面，而使“军阀”一词毫无疑问地成为贬词，并已有人使用其贬意。1918年底，陈独秀就曾为军阀下过定义，他认为：军阀是毫无知识，毫无功能，专门干预政治、破坏国法、马贼式的、恶丐式的人物。1919年，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曾说军阀的特征是外强中干，上刚下柔。同时孙中山也在给他人的信件中第一次使用了“南中军阀”一词。1920年初，政论家谭平山比较明确地界定了军阀的含义，他说：“握了一种特殊的势力，成了一种特别的阶级，组织了一种特别的系统，这就叫做‘军阀’。”





北伐战争时，“打倒军阀”的口号响彻神州，“军阀”已完全成为贬辞。当时的胡汉民和蒋介石等似乎都曾为“打倒军阀”这一口号作注解，而对“军阀”下过定义。胡汉民在一次演讲中曾说：“一个军人上没有为国家的利益，下没有听民众要求解放的呼声，只是前面靠官僚、政客、土豪、劣绅以及一切反革命势力做了虎狼；后面勾结着帝国主义做了声援，这就是军阀。”蒋介石在另一次谈话中也曾说：军阀把持的是地盘，要的是财产，爱惜的是自己的生命，取给的是帝国主义。以后，这个问题很久没有人正式涉及，直到近二十多年，由于民国史和北洋军阀史的研究与编写又引起人们的注意，海内外学者都对此发表过意见。中国现代史学者彭明曾在《北洋军阀(研究提纲)》中提出对军阀一语的三条定义，即：“他们各有一支为自己争权夺利而服务的军队”，“他们各有一块可以任意搜刮和统治的地盘”，“(他们)大都是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统治的工具”。《中华民国史》的主编李新曾反复发表自己的论点，概括起来也就是私兵、地盘和武治(武力统治)三条，没有太多的超越。1989年，台湾学者张玉法提出如下四点作为军阀定义的依据，即：(1)养军的目的是追求个人和本军的利益；(2)武力被当做解决纷争的正常途径；(3)军事权不受行政权的拘束；(4)国内如此，甚至国际种种秩序、法律也不顾及。

海外一些学者对此问题也有所研究，并发表自己的见解。1973年，日本学者波多野善大在集结其历年有关近代军阀论文所编的《中国近代军阀的研究》一书中，分析了近代军阀所具有的五种性格，即企业性，买办性，地主性，兵士素质差、与土匪没有什么差别和军队的私兵性，其第四项似可简称为土匪性。与此同时，由美国历史学者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第六章的分撰者薛立敦曾作过如下的表述：“最简单地说，‘军阀’就是那种指挥着一支私人军队，控制着或企图控制一定地盘，并且多少是独立行动的人。在中文中，‘军阀’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令人想起一个自私的、丝毫没有社会意识或国民精神的司令官。”

综合中外学者的研究，并无太多的分歧。如果以私兵、地盘和武治三条件来诠释军阀，那么与近代北洋军阀的内涵正相吻合，所以我们对北洋军阀集团可以作如下的表述：

北洋军阀是以一定军事力量为支柱，以一定地域为依托，在“中体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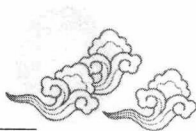
用”思想指导下,以封建关系为纽带,以帝国主义为奥援,参与各项政治、军事及社会活动,罔顾公义,而以只图私利为行使权力之目的之个人和集团。

### 三、北洋军阀的特点

第一,北洋军阀集团是以封建地主阶级为主要的社会基础。它的某些部分在一定时期带有资产阶级性质。这种变化发生的时间大致在 1914 年以后。

北洋军阀的大小军阀普遍地霸占土地、广置田产房舍,进行封建性的榨取和剥削,它的总首脑袁世凯在河南彰德、汲县、辉县等地占有土地 400 顷左右,其家族占有彰德全县田产的三分之一。奉系军阀张作霖依恃权势攫夺了大量土质肥沃、交通便利的良田美产。直系军阀李纯因历年在江苏、江西等地搜刮民脂民膏而拥有巨额财富,他除储存了黄金、珠宝和股票外,还把大量财富投放到土地和房产上,其中仅天津地区的地产就近百顷,值银近 30 万银元;在津出租的房屋有 6 000 余间,值银 127 万余银元;另有家存现金达 300 余万银元。

北洋军阀集团的大小军阀早期由于大多出自农村,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进行封建性剥削的手段比较熟悉。对于近代工业,一方面由于当时的发展尚不显著引人;另一方面这些军阀缺乏对近代工业的充分了解,还不大熟悉资本主义的剥削手段,多数军阀基本上仍是霸占土地的大小地主,因而北洋军阀集团仍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主要社会基础。但是,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工业利润成倍增长,大大地超过了地租剥削所得,从而引起了他们的贪欲,于是纷纷向工业投资。这种投资活动特别显著地表现在天津地区,从 1914 年至 1925 年,天津新建工厂 26 家,其中北洋军阀投资的有 11 家,占新建工厂的 42.3%。这 11 家工厂的资本总额是 1 520 万元,占 26 家资本总额 2 926 万元的 53.7%。如 1918 年开业的裕元纱厂实际上就是安福系军阀官僚所办,该厂董事会的主要成员有:国务总理段祺瑞、安徽督军倪嗣冲、陆军次长徐树铮、外交总长曹汝霖、交通总长朱启钤、众议院长王揖唐和安福议员王郅隆等。全部股本 200 万元,仅倪嗣冲一人就占有



110 万元。在直隶遵化、兴隆一带有倪嗣冲、冯国璋的三处金矿。山东的中兴煤矿就是徐世昌、朱启铃等人用私人名义创办的。号称“北四行”的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四家银行的资本也主要来源于北洋军阀的投资——即倪嗣冲、徐树铮、徐世昌、王占元、吴佩孚、孙传芳和冯国璋等人。北洋军阀的要人在各企业中的投资数目都很惊人。据一种不完全的统计：徐树铮 800 万元、徐世昌 1 000 万元、靳云鹏 2 000 万元、倪嗣冲 2 500 万元、梁士诒 3 000 万元、王占元 3 000 万元、曹锟 5 000 万元。因此，北洋军阀集团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资产阶级性质。

军阀们通过地租和企业投资获得利润，又以所得进行高利贷剥削和购置土地。这三者的资金相互转化、增值，使这批人物既成为地主阶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在一定时期进入了资产阶级的行列，带有某些资产阶级色彩。这就是北洋军阀集团最根本的特点，也是它与旧的封建性军阀的主要分界点。

第二，它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为指导。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晚清时期洋务派提出来用以挽救清朝政权灭亡命运的“救世良方”。小站练兵就是“中体西用”指导思想在军事方面的应用和体现。袁世凯提出“训以固其心，练以精其技”作为其建军的基本方针，即以封建伦常关系来固结军心，以西方军械操典来强化军事技能。他更明确提出“兵不训不知忠义”、“兵不练不知战阵”等主张，把训与练作为两大建军思想和练兵内容，实质上体现了“中体西用”的思想，而为当时朝野上下所重视与接受，从而使他的练兵得到较充裕的供应和装备，使北洋军阀集团在创建阶段能够顺利地发展和壮大。

民国以后，北洋军阀集团掌握了政权。它面临的是一个新旧并存、中西杂陈的过渡性社会。它把“中体西用”思想推衍到政治范畴。所强调的“中体”，虽然不能公然宣扬“君权”，但其核心内容仍然是封建主义的伦常关系；而所谓“西用”，已不仅采用西方的军事操典、器械、营规，还借用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如宪法、议会、选举等等。所以，北洋军阀控制下的民国政府，只是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撞击下体现“中体西用”的军阀政权而已。所谓国会选举、府院之争及历次阁潮等等，无一不是北洋军阀集团利用西方民主形式来达到其封建性目标的所作所为。各种民主机构、甚至宪法都被北洋军阀集团用来作为封建性统治的装饰品和工具，一旦不合于“中体”，那“西用”就会成为牺牲



品,如解散国会、缴销议员证书、暗杀政党领袖等,终而要埋葬民国,实行帝制。

北洋军阀集团的“西用”内容比较明显,而“中体”内容究何所指?我们认为:它基本上是儒家的封建伦常关系。有人认为北洋军阀集团不是儒学之士,这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受过教育的军阀不过占其中的30%,而其余的大部分是文盲或半文盲。这些人当然不可能真正准确地理解儒家文化,但不能认为他们没有受到从封建制度下因袭而来的传统儒家文化所给予的影响(如思想观念、礼俗、习惯、传说等等),而且他们确在实际生活中利用了儒家文化。加拿大籍华人学者陈志让曾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他说:“北京政府自1912年建立到1928年倒台,控制它的军阀始终固守着儒家思想,同时更试图借着儒家政治原则来统治这个儒家体制已经解体的国家。”所以,北洋军阀集团的“中体”可以作如下的概括,即: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以封建伦常为纽带,维护一种异常明显的层次性宝塔式的统治系统和等级隶属关系,以延续甚至恢复封建体制和封建行为规范。

吴佩孚是北洋军阀集团中的“中体西用”思想的典型。他一方面以“儒将”自命,崇尚关、岳,标榜维护华夏尊严,排斥外来事物,以此所谓“中体”适应封建守旧的口味;另一方面又改革军事,聘请洋顾问,接受西方文化,以此所谓“西用”博取西方资产阶级的赞誉。吴佩孚按照半封建半殖民地“中体西用”的思想要求,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学贯中西”而为中外人士都能接受的人物。他机智地利用民主舆论,高唱救国爱民以粉饰自己,而实际上却制造“二七”惨案,怂恿曹锟贿选,组织直奉联盟等等,以维护封建主义之体。1929年,吴佩孚全盘失败、退出政治舞台后,似乎经过自省反思,发表了《循分新书》,明确地阐述其“中体”思想。他说,要“奉行礼教以达圣人境界”,并认为“共和是现今社会道德的衰微”,要“振衰起敝,唯一之道是要振兴文化”。

这就是北洋军阀集团主流思想的代表。但事与愿违,他们由于无知、少知和悖于时代要求,宣扬和利用儒家文化中过时的糟粕,即那些难以为时代所接受、甚至令人发噁的丑陋内容。他们所谓的“振兴儒家文化”,实际上是践踏儒家文化和对儒家文化进行了一次大破坏。儒家文化中应该扬弃的陈腐部分和弱点被他们“提倡”得暴露无遗,以致“五四”运动针对这些社会现象提出了“打倒孔家店”这类近乎绝对化的口号与此不无关系。可以说,具有“中体西用”指导思想又是北洋军阀与前军阀的不同点。



### 第三,割据称雄,拥兵争霸。

北洋军阀不仅那些镇守使、督军、巡阅使、联帅割据一地、一省,甚至数省,就是已经掌握北洋政府权力的派系也都有一定的直辖范围。皖系控制了山东、山西、安徽、浙江、福建、陕西、甘肃、新疆八省与热河、察哈尔两个特别行政区及淞沪护军使所辖区域;直系则控制直隶、湖北、河南、江西、江苏五省与绥远特别区、宁夏护军使所辖区域。直皖战争后,直系势力勃兴,地盘更有扩大。奉系除以东三省为主要基地外,还深入到蒙疆、京津、热察等地。北洋军阀集团内部互相倾轧、争夺,甚至混战,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争夺地盘。他们深深懂得:如果没有地盘,那就无法立足和存在下去。因为割据一方就可以解决兵源、财源两大问题。他们可以在辖区征募士兵,强派夫役,为他们的争权夺利去卖命和服役,还可以在辖区搜刮财物以供战争之粮糈和私欲之挥霍,如直系军阀张英华,1926年在河南一省所勒缴的捐税就有:

(甲) 正杂税经常收入 1 100 万元(其中包括田赋丁漕、契税、百货厘金、牙税、屠宰税等);

(乙) 非法税收,如对日用必需品之盐即由引岸管理局新设盐务督销处每年增收约 600 万元;

(丙) 纸烟特税 300 万元;

(丁) 1927 至 1929 年田税丁漕预征约 1 400 万元。

以上四项合计共达 3 400 万元,再加上滥发纸币、驻地征派等,总计达 1 亿元以上。其他军阀割据地区也莫不如此。

有兵斯有权,这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大特点。它更体现在北洋军阀身上。当他们割据一方自雄时,必须要有兵力来维护地盘并发展自己的势力;而当他们掌握全国政权时又必须运用兵权以实现武力统一,巩固它的统治权。当时全国兵员数目已相当庞大,如 1916 年,全国的正规军、巡防队和杂牌队伍,共计有兵约 65 万名,且未计官佐在内。这显然是官方缩小的数字,所以,另一份资料的统计则为 878 090 人。至 1919 年即达 138 万多人。1925 年又增至 1 436 180 人,比之 1916 年,仅仅十年即增加 50 多万兵员。当然,北洋军阀集团各派系的兵员在其中即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他们无不抓紧时机,扩充兵员,如直皖战争前,皖系拥有 3 师 4 旅的兵力;直皖战争后,直系崛起,其嫡系兵力即有 7 个师、5 个混成旅。第一次直奉战争前直系兵力已近 10 万,到第二次



直奉战争前夕,经过大事扩充,殆达 25 万人之众。奉系在 1921 年时拥有 5 个师、23 个混成旅、3 个骑兵旅的兵力,而到了 1925 年 9 月奉系鼎盛时期,兵员增至 36 万余人。这 36 万人的分驻情况是:李景林部 6 万余人,驻直隶;张宗昌部 9 万余人,驻山东;张学良、郭松龄部 7.5 万余人,驻京奉路沿线;江苏有奉军 3.3 万余人,驻南京、上海、徐州一带;东三省和热河有 11 万人,驻东三省及热河。

在北洋军阀集团内部似乎形成这样一种风气,就是不论官位多高,都要亲自抓一支军队在手里。袁世凯的权力已达顶峰,但是他仍然要成立一个模范团,自兼团长,名为培训军官,实则抓住实力核心;又专门成立一个“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亲自定夺一切军事要政。段祺瑞媚日卖国,冒天下大不韪,专门编练一支“参战军”。一般情况下,军阀们决不放弃亲领军队的师长之类的官位,如权倾中外、显赫一时的吴佩孚是以第三师师长兼巡阅使;五省联帅孙传芳是以巡阅使兼第二师师长;奉系首脑张作霖除东三省巡阅使、蒙疆经略使、热察绥三特区都统等三项重要职务外,仍兼任第二十七师师长。正因为军权重要,所以一旦打算更动或剥夺其实际军权时往往会发生变故,如吴佩孚曾把直隶督军王承斌所兼第二十三师师长、河南督军张福来所兼第二十四师师长、湖北督军萧耀南所兼第二十五师师长职衔一律开去;他又想免去齐燮元所兼第六师师长、王怀庆所兼第十三师师长、郑士琦所兼第五师师长职衔,结果在直系内部招来了这些大将的猛烈反对,王承斌甚至到保定见面曹锟,以辞职相要挟。北洋军阀之所以如此“爱兵如命”,是由于处在军阀割据的条件下,不如此就无法保护他们的地盘和职位,也就无法立足于当世。有些军阀史的研究者如陈志让教授就说:兵养得愈多愈好,军阀的权力愈大;一旦释了兵权或失去了兵权,军阀连自己的生命财产也难以保存。失掉了兵权的军阀的处境比破了产的企业家更危险。

第四,各树派系,荣损与俱。

北洋军阀内部为了权力分配而各树派系。他们利用幕僚、门客、同乡、同学、师生、姻亲和结义拜盟等封建关系结合在一起,相互依附,进行种种争权夺势的活动。北洋军阀集团在创建时期就有北洋武备学堂学生的纠集,显示其举足轻重的作用,至民国以后,除车庆云一人外,这一伙人都得到了省长的位子,这是同学关系的结合。但是,这种关系并非绝对牢不可破,往往随着权力



的不断再分配而使原有的关系发生变化,并形成派系间的倾轧。如段祺瑞与曹锟是保定军官学校同学,但分别是直、皖两系的首脑,在矛盾趋于尖锐时,甚至可以兵戎相见,直皖与两次直奉战争都是明显的例证。直皖战争中,曲同丰以老师之尊被他的学生吴佩孚所俘而成为阶下囚。不过,当损及整个集团的根本利益时,又可重修旧好,如直奉的“反赤”联合。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各派系都奉行“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信条。一人得道,鸡犬飞升;一朝失势,树倒猢猻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正是北洋军阀集团派系势力消长的真实写照。如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内部明显分裂。段祺瑞以资深继起,权倾中外,门生故吏、亲信爪牙无不飞黄腾达,窃居要津,平步青云,不可一世,而被视为皖系军阀。但当直皖战争后皖系失败,直系登上北洋政府舞台,于是直系人物沐猴而冠,弹冠相庆;而皖系要员如徐树铮、吴光新、曲同丰、曾毓隳、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等则被明令通缉,身等罪犯,狼奔豕突,声名狼藉,几无立足之地。

北洋军阀集团不是单纯的军事集团,而是对政治、军事、财政、外交诸方面都具有操纵控制权的集团,所以它不是清一色的军事集团。它除一批愚而自用、狡而弄权、形形色色的赳赳武夫外,还有一批赞画帙幄、推波助澜的政客帮闲。这些人厕身于军阀幕下,为之密谋划策,而军阀也依靠这些人为左右手而呼风唤雨。两者狼狈为奸,同恶相济,给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与祸害。如阮忠枢入袁世凯幕未久,就被袁世凯大加倚任,新军军制饷章、文牍机务,都由他经手。阮忠枢一直为袁世凯办理切身政务机密,充当袁世凯与文武部属间的联络人员。袁则赞誉他“才长心细,学博识优”。徐世昌是袁世凯的高级谋士,为袁世凯起草文告,制定策略,密谋措施,无不用心,成为北洋军阀集团的轴心人物。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综揽中枢,又兼理金融,事权之大,罕有其匹。帝制时更组织“各省请愿联合会”,假民国之名,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还网罗了杨士骧、杨士琦、孙宝琦、杨度、赵秉钧、陈璧、胡惟德、朱家宝、吴重熹、周学熙、田文烈、张一麀、曾广钧等辈,作为自己的亲信僚属,结成一幅“爪牙布于肘腋”、“腹心置于朝列”、“党援置于枢要”的政治罗网,撒向全国,这种古无今有的局面正是北洋军阀集团势力迅速膨胀的重要因素之一。

##### 第五,纵横捭阖,制造政潮。

北洋军阀集团为巩固和加强本集团、本派系和个人的权力与利益,不仅凭



借军事实力,而且还要弄政治手腕。辛亥革命以后,由于资产阶级民主观念普及全国,得到广泛传播,即如北洋军阀集团的匹夫悍将也不得不以虚伪的姿态,盗用民主旗号,利用国会、议员、宪法、选举等等作为牟取集团和个人私利的工具,纵横捭阖地进行各种活动。他们把政局搞乱,以从中取利,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权力。袁世凯当政时,亲手导演了八次阁潮,无不为其走向帝制扫清道路。袁世凯始而以“政党内阁”之名,行“内阁政党”之实,对盲目相信其民主伪装而欲真诚贯彻“政党内阁”的宋教仁则视为政敌,不惜使用卑鄙的暗杀手段对付之;继而以“府院一体”之名,行“屈天下奉一人”之实,对欲执行“责任内阁”的唐绍仪,虽属旧僚故吏也不惜罢黜;终而收买政党,盗用名义,组织团体,请愿威胁,包围国会,强迫投票以实现洪宪帝制。及至帝制破灭,他又要段祺瑞“树责任内阁之先声,为改良政府之初步”,以应付危局,保全颜面。可是,这个一生玩弄权术,左右逢源的北洋军阀集团首脑终于心劳力绌,在自己视若股肱的亲信部属段祺瑞面前碰壁,被全国的反袁政治浪潮所吞没。玩火者必自焚,史有明训。

段祺瑞继袁世凯而起,一仍故智,始则纠集“公民团”,包围国会,殴辱议员,强迫通过“参战案”,借以组练“参战军”,扩充和加强皖系的兵力;继而策动“督军团”,制造“张勋复辟”,以树自己“再造共和”之功,并弃置国会与《临时约法》,公然宣称“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终而组织安福俱乐部,制造安福国会,操纵选举,以图控制全面政权,走上巅峰地位。但不幸被其后辈吴佩孚所击败,不得不息影政坛,遁迹津门,以图伺机再起。

吴佩孚是北洋军阀集团中继袁、段而后的中心人物。他既是能征善战的干将,又是制造政潮、玩弄权术的能手。1920年8月,当南北对峙、并立政府时,他通电全国,提出召开“国民大会”以解决国是的政治主张,企图制造一个政治工具来建立以他为中心的政府。这一企图由于张作霖的反对而未能如愿。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夕,他为了打倒奉系,先对由日本和奉系支持的梁士诒内阁制造“倒阁”政潮,后与奉张进行电报战的政治攻势达三个月之久,为第一次直奉战争击溃奉系作了舆论动员。

张作霖虽然出身草莽,但也涉足于政潮之中。他除了在幕后支持梁士诒、潘复之流组阁以控制政权外,还在第二次直奉战争获胜后,制造了一个临时执政府,又虚伪地拥戴皖系首脑段祺瑞出任执政,并由段祺瑞出面召开“善后会





议”，作出裁军息战的姿态，对人民进行政治欺骗，这个由张作霖制造的执政府不过是他以政治为儿戏所制造出的一个不伦不类的政治畸形儿而已。

由于北洋军阀集团的玩弄政治，致使政潮迭起，内阁更易频繁，在短短十六年中，内阁更换 46 次，正式上任和代署的阁揆达 29 人之多，多则三两年，少则数月，与明朝亡国之君崇祯十七年（1644 年）间易揆数数，可称后先媲美。是以政令纷更，社会动荡，人民不仅身受战火兵乱之苦，还要日日处于惶惶不安的心态之中。

#### 第六，卖国媚外，残民以逞。

北洋军阀集团以出卖国家利权，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来扩充实力，进而建立反动统治，控制和操纵政权。袁世凯在清末就以出卖路权来乞求帝国主义的培植。当时，由于他已在清廷中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成为日本企图在上层培植亲日势力的对象。日方一面敦促他招聘日本顾问，派遣留日学生，一面又向他提供新式武器。辛亥革命以后，他为了镇压革命，统治人民和为一姓的尊崇而谋实行洪宪帝制时，更不惜以国家权益换取善后大借款和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件”。

段祺瑞是继袁世凯之后，经日本帝国主义一手扶植的亲日势力。在皖系军阀掌握北京政府实际权力期间，皖、日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进行了多次大宗交易，据日方已公布资料，段祺瑞向日本进行各项借款达 3.8 亿余日元。他为适应日本的需要而以参战之名获取日本经济上、政治上的“援助”，编练了参战军 3 个师。他更肆无忌惮地与日本签定陆海军军事协定，允许日本在华驻军，并享有指挥中国军队的权力。直奉军阀也都竞相投靠帝国主义以换取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军事上的支持和援助。

正是由于北洋军阀集团和帝国主义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各方面相互勾结，遂使二者的利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于是，帝国主义便以政治上的承认与支持为条件而对其统制下的政府颐指气使；以军事上的资助军火，派遣顾问，训练军队而得以操纵武装，制造军阀混战；以经济上的借款设厂而得以劫取利权资源，终于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掠夺、奴役的对象。军阀们则由于借助帝国主义的支持和资助，就可以编练军队，增强实力，因而极大地满足帝国主义的予取予求，充当政治买办来巩固既得利益，并进一步攫取更大的权力。二者日益紧密的勾结，使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丧权辱国，连年战乱，给人民